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史

(第二版) 下册

《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组

非外借

高等教育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史

（第二版）下册

《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组

主 编 袁世硕

副主编 陈文新

主要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小舒 边家珍 阮 忠

孙之梅 李 浩 董上德

韩经太 傅 刚 廖 群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下册 / 《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
组编. --2 版.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8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ISBN 978-7-04-050117-9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
-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0819 号

责任编辑 胡蔓妮 刘纯鹏
责任校对 窦丽娜

封面设计 王 鹏
责任印制 尤 静

版式设计 于 婕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420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3.9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50117-00

目 录

第七编 明代文学

绪 论	3
第一节 明代的政治环境与文坛格局的异动	3
第二节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雅俗文学的消长	7
第三节 明代文人的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	10
第四节 明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与作家群体	13
第一章 明前中期诗文	19
第一节 明初诗文	19
第二节 成化至正德年间的诗文	23
第三节 嘉靖、隆庆年间的诗文	25
第四节 八股文的定型与繁荣	28
第二章 明代文言小说	34
第一节 “三灯丛话”及其他	34
第二节 中篇传奇小说及笔记小说	39
第三章 《三国志演义》	42
第一节 《三国志演义》的成书、作者与版本	42
第二节 《三国志演义》的文化内涵	44
第三节 《三国志演义》的创作特征	49
第四节 《三国志演义》的影响	54
第四章 《水浒传》	57
第一节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作者、版本	57
第二节 《水浒传》的结构和主旨	60
第三节 《水浒传》与说话中的“小说”传统	64
第四节 《水浒传》的影响	68

第五章 明代戏曲	72
第一节 明代杂剧的历史进程	72
第二节 明代传奇的历史进程	74
第三节 吴江派与“汤沈之争”	79
第六章 汤显祖	82
第一节 汤显祖的生平与人生观	82
第二节 《牡丹亭》	84
第三节 汤显祖的其他剧作	87
第七章 《西游记》	90
第一节 《西游记》故事的流变、作者问题及版本	90
第二节 《西游记》的内涵	91
第三节 《西游记》的审美特征	96
第四节 《西游记》的影响	98
第八章 《金瓶梅》	102
第一节 《金瓶梅》的成书年代、作者与版本	102
第二节 《金瓶梅》“寄意于时俗”	103
第三节 《金瓶梅》确立了世情小说的审美特征	105
第九章 晚明诗文	109
第一节 晚明诗歌	109
第二节 晚明小品文及其他	111
第三节 八股文的新变	116
第十章 明代话本小说	120
第一节 话本小说在明代的兴盛	120
第二节 “三言”的作品时代与创作特色	121
第三节 “二拍”所展现的人生场景	126
第十一章 明代词曲与民歌	130
第一节 明词	130
第二节 明代散曲	132

第三节 明代民歌·····	134
阅读文献·····	137

第八编 清前中期文学

绪 论·····	143
第一节 清前中期文化专制下的学术与文学·····	143
第二节 清前中期新的人文思潮与文学·····	145
第三节 清前中期文学的历史特征·····	147
第一章 清初诗文的繁荣·····	151
第一节 遗民诗人对明代诗风的因革·····	151
第二节 钱谦益、吴伟业与清初诗坛的新变·····	154
第三节 王士禛、查慎行等“国朝诗人”·····	157
第四节 清初词坛的中兴·····	159
第五节 学者之文与文人之文·····	163
第二章 清初戏曲与《长生殿》《桃花扇》·····	168
第一节 清初戏曲·····	168
第二节 《长生殿》·····	173
第三节 《桃花扇》·····	177
第三章 清初白话小说·····	181
第一节 小说名著续书·····	181
第二节 《醒世姻缘传》·····	183
第三节 李渔的拟话本小说·····	185
第四节 才子佳人小说·····	188
第四章 《聊斋志异》与文言小说再兴·····	191
第一节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创作·····	191
第二节 《聊斋志异》创作的基本特征·····	192
第三节 狐鬼故事的社会人生意蕴·····	194
第四节 文言短篇的艺术创新·····	197

第五节 文言小说的再兴·····	199
第五章 《儒林外史》 ·····	202
第一节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的创作·····	202
第二节 科举制下文人的腐败·····	204
第三节 正面形象的人文内涵·····	206
第四节 《儒林外史》的结构、笔法·····	208
第六章 《红楼梦》 ·····	212
第一节 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创作·····	212
第二节 《红楼梦》的悲剧意蕴·····	214
第三节 《红楼梦》的艺术叙事·····	217
第四节 《红楼梦》的影响·····	221
第七章 清中叶文学的多元格局 ·····	224
第一节 古典诗坛的分流·····	224
第二节 袁枚与性灵诗潮·····	230
第三节 酝酿变化的清中叶词坛·····	234
第四节 桐城派及骈文的复兴·····	237
第五节 小说、戏曲与讲唱文学的多样化局面·····	242
阅读文献·····	248

第九编 晚清文学

绪 论 ·····	253
第一节 晚清文学的社会背景·····	253
第二节 晚清文学的上下限、分期·····	254
第三节 传统文学的结穴与新文学的萌生·····	256
第一章 龚自珍的诗文 ·····	259
第一节 龚自珍的思想与文学观念·····	259
第二节 龚自珍的诗·····	261
第三节 龚自珍的散文·····	265

第二章 魏源、林则徐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时期的诗	269
第一节 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潮	269
第二节 魏源与林则徐的诗	272
第三节 太平天国时期江湜与金和	274
第三章 宋诗派的兴起与桐城派的承变	281
第一节 程恩泽、祁寓藻与宋诗派的兴起	281
第二节 何绍基与郑珍、莫友芝的诗	285
第三节 梅曾亮、曾国藩与桐城派的承变	291
第四章 古典小说的畸变	298
第一节 侠义公案小说	298
第二节 儿女英雄小说	300
第三节 狭邪小说	303
第五章 光、宣、民初的诗文	308
第一节 “同光体”及其他诗歌流派	308
第二节 “诗界革命”的发生与展开	312
第三节 诗歌革新的巨子——黄遵宪	315
第四节 革命派的诗	318
第五节 梁启超的“新文体”与散文变革	321
第六节 晚清的词	324
第六章 “小说界革命”与晚清戏曲	328
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与新小说的兴起	328
第二节 《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331
第三节 《老残游记》与《孽海花》	334
第四节 辛亥前后的小说	337
第五节 晚清戏曲	340
第七章 藏、蒙古、柯尔克孜族的三大史诗	345
第一节 藏族史诗《格萨尔》	345
第二节 蒙古族史诗《江格尔》	347
第三节 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	349

阅读文献·····	352
后 记·····	354
第二版后记·····	355

第七编

明代文学

绪 论

明代自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灭元建国，至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在煤山自缢，前后共历十六帝、二百七十七年。明代文学承宋元而来又自具特点。从横向看，小说、戏曲等文类蓬勃发展，成就卓越；而诗文领域则以复古思潮为主脉，流派之间和流派内部往复论争，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理论的繁荣，并对创作产生了显著影响；以诗、文为主体的雅文学和以小说、戏曲为主体的俗文学，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纵向看，明代文学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洪武至天顺年间，台阁文风绵延相续，并在总体上主导了文坛习尚；成化至嘉靖年间，前后七子的崛起导致“台阁坛坫，移于郎署”，文坛格局和文体布局大为改变；隆庆至崇祯年间，在汹涌澎湃的“主情”思潮中，晚明文学呈现出其特有的风貌。明代文学特点的形成，既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内部原因，又与明代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生态有关。

第一节 明代的政治环境与文坛格局的异动

明代政治环境的显著特征是：皇权极力压制士大夫阶层，士大夫的政治地位远远低于宋朝。这种政治环境对明代的文坛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明前期的极端皇权与台阁体、山林诗的相继兴盛

皇权对士大夫阶层的压制在明初达到了罕见的程度。宋代“偃武修文”，士大夫阶层得到礼遇。从消极方面说，宋代不诛大臣，对大臣的优容“超越古今”；从积极方面说，宋代明确承认士大夫与皇权是并立的政治主体，“共治天下”，“共商国是”，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地位得到体制的保障。而在明代，自开国之日起，就针对士大夫阶层设立了种种凌辱和诛戮的方法。明朝大臣被诛戮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被贬谪和挨廷杖更是史不绝书。废除历时一千馀年的丞相制度和历时七百多年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度是制度设计上的大事，它表明一点，只有皇权才是政治主体，士阶层不过是服务于皇权的政治工具而已。永乐、宣德间又致力于削弱诸王权力，建立内阁制度，进一步巩固、发展了皇权。作为极端皇权的附属品，“奸臣”专权和宦官干政是明代政治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严重问题。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有两类文学作品在明代前期相继兴盛：一类是直接服务于皇权的台阁体，一类是有意疏远皇权的山林诗。而明代中后期以文学创作尤其是戏曲来反映党争

或重大政治事件的风尚也与这种政治环境直接相关。

由元入明的宋濂（1310—1381）是台阁文风的先驱。宋濂、刘基（1311—1375）、高启（1336—1374）等作家，其成就最高、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都创作于元末。入明以后，他们或死于非命（如高启），或转而歌功颂德（如宋濂），这正是明初恶劣政治环境的产物。洪武间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割”（《明史·刑法志》），苏州文人姚润、王谟被征不至，都被斩首抄家。朱元璋还不断以文字狱威慑读书人，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代人作《谢增俸表》，其中有“作则垂宪”一句，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所作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以为“作则”是讥讽他“做贼”（参加过红巾军），“光天”是讥讽他头上无发（曾出家做和尚），于是大肆杀戮。如此严酷的高压手段，所造成的只能是“万马齐喑”的局面，朝廷官员多应制作文，颂圣或应酬。宋濂的“馆阁之文”最能体现明初文风的时代特色。洪武四年辛亥科状元吴伯宗，文章雍容典雅，为后来台阁体的滥觞。永乐至天顺年间，台阁文学臻于鼎盛，其代表人物是“三杨”——杨士奇（1365—1444）、杨荣（1371—1440）、杨溥（1372—1446），三位身居台阁的政要。其身份有两方面值得注意：其一，台阁文臣作为帝王的“文学侍从”，肩负着主导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如丘濬《送徐庶子归省序》所说：“翰林……其职务之大者曰进讲，曰编纂，曰校文。”所谓“进讲”，即为帝王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宗旨是引导帝王成为明君。所谓“编纂”，并非编纂一般的书籍，而是指《永乐大典》《性理大全》一类鸿篇巨制的著述，或有助于造成盛世文化景观，或有助于建立王朝的意识形态。所谓“校文”，即主持科举考试，掌握了对考生的黜陟之权，就可以借助国家权力来主导文坛风气。朱元璋曾规定“四书”“五经”为国子监的必修课，明令全国府州县学及闾里私塾“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毋以仪、秦纵横坏其心术”（《明书·学校志》）。朱棣命胡广、杨荣等人主持修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作为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核心教材。科举取士制度的确立和科举取士教材的确定，有效地实现了规范文化思想的目的。这种对文化思想的全面规范与台阁体制一拍即合，加上明代前期大体良好的经济状况和永乐以降士大夫阶层较为平稳的仕途，成功培植了延续数十年的安于四平八稳的时代精神，其占主导地位的艺术追求是表现“富贵福泽之气”。台阁体就是体现这种艺术追求的标本。其二，台阁文臣的职业取向是成为内阁大臣即协助帝王管理国家的要员。在明代，由翰林院庶吉士而纂修官而掌院官而内阁大臣，入阁已大体成为翰林院官员的专利。台阁派作家身份上的这两大特点，是我们考察台阁体流派风格的切入点。由第一点出发，台阁派主要以旨在“发明圣人之道”的宋文为榜样，对欧阳修尤其推崇；由第二点出发，台阁派诗人对唐诗的仿效，旨在以诗文显示国力强盛和世运升平。

山林诗自明初以来不绝如缕。15 世纪后期心学的萌芽与生长，潜在地包含着与乡愿哲学背道而驰的趋向，它与儒学中注重“孔颜乐处”的传统结合，促成了被称为“庄陈体”的山林诗的崛起。明代心学的两位前驱——陈献章（1428—1500）和庄昶（1436—1498），同时也是山林诗的代表作家。^① 其诗中风景与其所悟的“道”是融合在一起的。“道”与山水契合，所以心学家同时也是山林诗人；心学与乡愿异趋，所以山林诗与台阁体背道而驰。台阁体与山林诗不仅表现为作者身份的差异：一为台阁重臣，一为山林隐逸；还表现为其诗风的差异：前者盛行于宫廷、帝都，“平正纾徐”，“雍容雅步”，后者流传于山林、草野，清新自然，恬淡超逸；更表现为其价值取向的不同：前者体现出浓厚的廊庙意识，旨在显耀世运升平、国力强盛的气象，后者体现了高洁的隐逸精神，旨在表达远离朝市、安贫乐道的襟怀。

二、明中叶政治生态与李梦阳的“国士”风采、诗学谱系

宣德以后，阁权日重，阁首几乎成为宰相的另外一个名称。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明代的阁首也不能与宋朝的宰相相提并论。宋朝的宰相，其职能是与帝王“共治天下”；明朝的阁首，却是接受帝王的委托管理政务，他们只是皇权的附庸，很容易被士大夫视为奸臣。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另一方面加剧了朝臣之间的纷争，“忠奸之争”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核心话题。而臭名昭著的严嵩就是此时期奸臣的代表。极端皇权迟早要导致宦官干政。武宗时宦官刘瑾在原有的东西二厂之外又设立内行厂，肆意缉捕官民，弄得人心惶惶。明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摧折朝臣，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朝纲不振、奸臣和权阉时常作祟的明代中后期，士大夫阶层对权臣或阉党的抗争也就是对皇权的抗争，所显示的是一种匡救时俗的壮怀。这种抗争绵延相续，几乎没有中断过。比如，李梦阳（1473—1530）曾于弘治十八年（1505）上书孝宗，淋漓尽致地指陈“二病”（士气日衰，内官日横）、“三害”（兵害、民害、庄场饥民之害）、“六渐”（匿之渐、盗之渐、坏名器之渐、弛法令之渐、方术蛊惑之渐、贵戚骄恣之渐），最后直指皇后之弟张鹤龄“招纳无赖，罔利贼民，势如翼虎”。因这封疏，他一度被捕下狱。正德元年（1506），李梦阳又因反对宦官刘瑾下狱，几乎被杀，赖康海等说情而获释。《明史》以“国士”目之，他是

① 俞弁《逸老堂诗话》：“山林则陈白沙、庄定山称白眉。”陈献章、庄昶的诗，人称“庄陈体”。从其表达的方式来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排比“理语”入诗，而缺乏理趣的涵泳，其哲学的特性超过了诗的特性；一类是真能做到哲理与诗心互相凑泊，浑融无间，即钱锺书《谈艺录》所谓“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也”。前一类作品，被称为“性气诗”；后一类作品，即我们所关注的山林诗。

当之无愧的。

李梦阳在建立诗学谱系时，上溯杜甫，亦意在确立以表达社会关怀为宗旨的诗风，这显然是针对茶陵派而来的。茶陵派代表人物李东阳在政治上与刘瑾等权阉虚与委蛇，在诗风上亦雄健之气不足，他对杜甫不甚心仪即是回避社会矛盾的表征。李梦阳心仪杜甫的沉郁、雄浑而不甚推崇王孟的清新隽逸，则是因为他忧国伤时，敢于直面社会问题。他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比如其《土兵行》，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一引《国史唯疑》：“江西苦调到狼兵，掠卖子女。其总兵张勇以童男女各二人送费文宪家。费发愤疏闻，请严禁。诵李梦阳《土兵行》诸篇，情状具见。”又如其《玄明宫行》，据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一引《名山藏》：“司礼监刘瑾，请地数百顷，费数十巨万，作玄明宫朝阳门外，以祝上厘。复请猫竹厂地五十馀顷，毁民居千九百馀家，掘人冢二千五百馀。筑室僦民，听其宿倡卖酒，日供贍玄明宫香火。”刘瑾筑玄明宫，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李梦阳《玄明宫行》写武宗宠信宦官，虚耗国库，大兴土木，足补史阙。

三、明代后期的党争与文学创作

李梦阳等前七子对权阉的抗争只是政治环境影响文学的例子之一。其他如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之争、嘉靖年间严嵩集团与反严嵩集团之争、万历以降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都从整体上对文坛格局产生了影响。明代中叶以后的不少作品，甚至就是当时党争的产物或直接写当代党争的，如相传为王世贞门人所作的传奇《鸣凤记》、张溥的古文《五人墓碑记》、冯梦龙的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明末清初李玉的传奇《清忠谱》《一捧雪》等。诸多文人社团，如后七子、复社、几社，其兴盛和发展都与反权奸、反阉宦有关，其诗风和文风不同程度地受到党争的影响。还有一些作品则是现实党争或现实政治的折射。李开先的传奇剧《宝剑记》写成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该剧取材于《水浒传》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而林冲与高俅等人的矛盾，主要是由于林冲一再参奏童贯、高俅等树党营私、祸国殃民，并非单纯因为高衙内图谋林妻。《宝剑记》突出了“诛谗佞，表忠良”的内涵，着力写“忠奸之争”，比《水浒传》具有更强的政治意义。稍后梁辰鱼作《浣纱记》，借生旦爱情写吴越争霸，把男女爱情和国家兴衰结合在一起，曲折表达了对明朝政治的不满。徐渭的杂剧作品《狂鼓史》写祢衡在阉罗殿上击鼓骂曹，痛斥曹操“哄他人口似蜜，害贤良只当耍”，前人称赞此剧足以使奸雄裂胆，亦有其现实的针对性。像《宝剑记》《浣纱记》《狂鼓史》一类作品，虽然不是直接取材于当代重大政治斗争，却毫无疑问与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重要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

关。这些作品站在正义和公理一方，指斥强权，鞭挞邪恶，表现出是非分明的政治态度。

第二节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雅俗文学的消长

大体说来，15 世纪末叶之前，明代文坛以雅文学为主体，台阁体则居于雅文学的核心位置。15 世纪末叶以降，雅、俗文学开始了并驾齐驱的状态，一边是前后七子和唐宋派的兴盛，另一边则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刊行和传奇剧的蓬勃发展。至万历年间，俗文学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文人改定、出版长篇小说和戏曲作品成为文化生活中的一道亮丽景观，诗文创作和评论也受到俗文学的濡染。一批诗、文、小说、戏曲兼长的作家，如李开先（1502—1568）、徐渭（1521—1593）、汪道昆（1525—1593）、屠隆（1542—1605）、汤显祖（1550—1616）、冯梦龙（1574—1646）等，都出现于 15 世纪末叶以降。雅俗文学的这种消长情形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影响、思想文化的变迁等密切相关。

一、商业活动的缓慢增长与俗文学的滥觞

明代初年，朱元璋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业活动严加控制，目的是改变城市居民的奢靡生活方式。对戏曲演出也严加管理，凡与教化无关的戏曲演出均在禁止之列。在这种背景下，北杂剧以朱权（1378—1448）、朱有燬（1379—1439）为代表作家，所作多为宫廷化、贵族化的节义剧、庆贺剧和神仙道化剧。小说领域的情形也不乐观，仅有瞿佑《剪灯新话》、李昌祺《剪灯馀话》等几种文言小说，而其作者得到的主要是负面评价，李昌祺就因为作了《剪灯馀话》而不能入乡贤祠。《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仅限于在民间流传，无缘刊刻行世。这是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年间的状况。天顺、成化年间，两京和江浙地区出现了城市经济初步繁荣的局面，广州、武汉、芜湖等城市也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市民数量迅速增长。小说、戏曲的创作、刊印、演出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增加。正统十年（1445）进士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一《小说戏文》记载：“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成化二年（1466）进士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也记载：“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凄惨。此盖南宋亡国之音也。其贗为妇

人者名妆旦，柔声缓步，作夹拜态，往往逼真。”这些记载表明，天顺至弘治年间，小说、戏曲显示出了兴盛的势头。成化七年至十四年（1471—1478）北京永顺堂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包待制出身传》等十余种词话，是明初至弘治年间幸存的白话小说作品。士大夫文人创作的第一部传奇剧是丘濬（1421—1495）作于成化年间的《伍伦全备记》。

二、儒商的大量产生与俗文学的迅猛发展

儒家学者或深受儒学熏陶的文化人对商人或商业作正面评价，这是产生于明代中叶的一个重要事实。西汉以降，直到宋代，儒家对商人或商业的态度以鄙视居多。宋明理学史上第一位公开肯定“商”的价值的是王阳明。1525年他为商人方麟作墓表（《节庵方公墓表》），其中有这样一句：“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王阳明将士农工商并提，认为商亦可志于“道”，这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思想。

商人和商业备受推崇，市场经济的异常活跃是一个原因，但另一个原因也许更为重要，即大批读书人进入了商人行列，“弃儒入贾”不再是个别事例，商人的整体素质明显提高。读书人之所以“弃儒入贾”，在于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数量剧增，而有机会入仕者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16世纪初叶，民间流行一个说法：“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对这些没有机会入仕的读书人来说，“入贾”是解决家庭生计的较好选择。与王阳明时代相近，陆树声、李梦阳、唐顺之、王世贞、徐渭、李维桢等人所作的墓志铭、行状、传记中，都记叙了为数可观的“儒商”。而同一时期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出身于商人家庭者占了很高的比例。李梦阳、李贽的父祖辈都曾经商。江浙地区的文化人，如唐寅、王宠、袁袞、黄省曾、何良俊、陈束、汪道昆、屠隆、张凤翼、沈明臣、顾宪成、高濂等，都出身于商家。凌濛初、毛晋、陆云龙等热心于小说、戏曲的作家，还曾兼营出版业。大批读书人进入商人行列，不只是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把儒家的价值理念带进了商人群体。其中特别杰出的一些商人，“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以财富来推动公益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已成为社会责任的自觉承担者。

阳明心学与民间社会的密切联系也与王阳明对商人或商业的正面评价有关。王阳明重提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孟子·告子上》）的命题，教人在一念发动处把握住良知、天理，目的是为了“觉民行道”。而王阳明之所以如此热心于“觉民行道”，一方面是因为失望于极端专制的明代政体，“得君”无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对“皆知自致其良知”的“天下之人”充满信心，“觉民行道”有其现实的可能性。阳明心学的信奉者中不乏商人，这在宋明理学的演进史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儒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与日俱增，一个新的